

主编 阎纯德 吴志良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列国汉学史书系

美国汉学史

(下册)

熊文华 著

苑出版社

主编 阎纯德 吴志良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列国汉学史书系



美国汉学史

(下册)

熊文华 著

學苑出版社

(十一) 以关切和批评为探索中国思想文化动力的墨子刻

1933年墨子刻出生于一个德国犹太人家庭,祖父是富商,父亲阿诺德·墨子刻(Arnold Metzger)是一位酷爱音乐的哲学家,曾撰文批判纳粹时代文化。因为受到了希特勒政权的迫害,他毅然带领全家移居美国,定居于波士顿。墨子刻从小受到父亲言传身教的影响,长大后成了一位大提琴演奏高手,专业上对西方哲学史情有独钟。

20世纪50年代,墨子刻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时曾倾心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爱看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The Red Star Over China),并自学中文。1952年芝加哥大学毕业后他曾在美国陆军乐队服役,后入华盛顿乔治敦大学,1959年获得硕士学位。他受到拉铁摩尔的学术思想影响对中国边疆历史很感兴趣,他的硕士论文就是有关中国的蒙民政策研究。

获得硕士学位后墨子刻进入了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课程。在导师费正清的指导下,他开始研究陶澍(1779—1839)经世改革、两淮盐法和清代的官僚制度,以《清朝官僚体制的内在组织》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在撰写论文过程中他深入研究了《大清会典》和《处分则例》等史籍,了解到清代的官僚组织其实是一个颇有效率和改革机制的机构,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精神鼓励下不少官员都做出了成绩。1967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历史与远东语言系博士学位。

墨子刻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好感,学习中国文化使他感受到精神上的激励,他认为《论语》比圣经更能打动他的心弦。他在推崇中国文化的同时对乌托邦精神持批判态度。通过中西政治和知识的对比,他对受到西方冲击的中国近代思想体会良多。

1977年墨子刻出版的《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一书是他对儒家学说多年研究的成果,涉及了宋明理学、清代官僚制度、当代毛泽东思想和新儒家学说,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可以揭示宋代以后新儒学与政治发展之间的联系。他发现中国近代历史上出现的变化,除了源自于西方的影响外,主要还是中国传统思想本身所发挥的核心作用。虽然西方的现代技术和意识形态赋予了中国人一种能动力量,但是中国人的自我觉醒和求新变革的长期奋斗精神却更为重要。该书的理论价值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认为它奠定了作者在中国思想研究领域中的地位。1979

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在洛杉矶召开年会时曾围绕该书的中心论题和研究方法展开了热烈讨论,一致肯定它对推动美国的中国思想研究所做的贡献。

1998年墨子刻在《中国历史语境中的西方市民社会观念》一书中对近年来一些中国学者套用西方“市民社会”的概念来考察中国历史的现象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学术交流和借鉴本来无可厚非,但是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市民社会”,西方的这一理想是否对现代中国政治产生过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中国知识传统的型塑,却令人怀疑。他说西方的“市民社会”是指某种非乌托邦的政治秩序,其特征表现在国内事务、经济领域、文化活动和政治互动等方面,个人或群体可以从中协调,但是不受国家的直接控制。在一些中国学者的著述中,这种自下而上的“市民社会”定义却被修改了。在他们看来圣贤掌控国家或者获准对社会实行指导可与“市民社会”挂钩。这类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可能导致国际关系复杂化。

1968—1969年墨子刻曾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任汉学讲师一年,后赴台北斯坦福中心进修汉语。1970年他应聘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教,由助理教授逐步晋升为教授。1980年他荣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员协会优秀奖。1990年他退休后成为该校讲座教授,同时兼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

墨子刻退休后在学术界仍然非常活跃,国内外的活动几乎排满了日程。1982—1985年他在台湾师范大学任客座教授,199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为港台大学合作交流项目“钱穆历史文化讲座”授课。1995年他应邀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担任客座教授,2000年任武汉大学客座教授,2001年秋应聘担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同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客座研究员。2003年3月他在密歇根大学汉学研究中心举办的“唐君毅系列讲座”发表了就职演讲;2004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举办的“大厦论坛”发表演讲。他还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举办的有关钱穆(1895—1990)、唐君毅(1909—1978)、牟宗三(1909—1995)和徐复观(1903—1982)讲座发表了基调演说。2004年他还与北京国际儒学协会签署了为期五年的顾问合同。2005年他应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客座教授。

墨子刻撰写了许多论文、书评和专著,对中国的官僚组织、儒家传统的

连续性、乌托邦与现代化、新儒家思想的时代意义等课题都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不只是学术研究的课题,更是一种学问和智慧。听过他讲课的学生都能回忆起课堂上许多精彩的一瞬间——极富哲理沧桑的幽默。

他的主要著述有:

《清代商界的组织能力》(The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of the Ch'ing State on the Field of Commerce, in W.E. Willmott, e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年)。

《清朝官僚体制的内在组织:合法性、规范性和融通性面面观》(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Ch'ing Bureaucracy: Legal, Normative and Communication Aspects, Harvard studies in East Asian law, 1973 年)。

《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年)。

《中国思想的部分古代根源》(Some Ancient Roots of Chinese Thought, in Early China, 1987 年)。

《中国现代与前现代之间的衔接》(Continuities between Modern and Premodern China, in P.A. Cohen and M. Goldman, eds., Ideas across Culture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年)。

《大中华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相互对抗还是彼此尊重》(Greater China and U. S. Foreign Policy: The Choice between Confrontation and Mutual Respect, Co-authored with Ramon Hawley Myers,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6 年)。

《超越西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目光和邓小平现代化纲领理据》(Transcending the West: Mao's Vis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Legitimization of Teng Hsiao-ping's Modernization Program,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6 年)。

《中国历史语境中的西方市民社会观念》(The Western Concept of a Civil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History, Hoover Press, 1998 年)。

《中国民族主义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ese Nationalism, co-authored with Ramon H. Myers, Hoover Digest No. 2, 1998 年)。

《飞越太平洋上空的云朵:当今中西政治理论冲突论文集》(A Cloud Across the Pacific: Essays on the Clash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litical

Theories Today,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5 年)。

《北京不可思议的事情》(Enigma in Beijing, Hoover Digest No. 2, 2005 年)。

《邻国龙》(The Dragon Next Door, Hoover Digest No. 4, 2006 年)。

(十二) 倡导在史学研究中以中国中心观取代种族优越感的柯文

1934 年 6 月 2 日柯文出生于美国纽约。1952—1953 年他就读于康奈尔大学, 1955 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转入哈佛大学, 师从费正清和史华慈研究中国思想史和中西关系史, 1957 年他从哈佛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 1961 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除了英语外他还精通法语、汉语和日语, 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62—1963 年他被密歇根大学聘任为客座讲师, 1963—1965 年担任阿默斯特学院助理教授, 1965—1971 年任马萨诸塞州韦斯利学院副教授, 1971—2000 年任伊迪丝·斯迪克斯·沃瑟曼亚洲研究和历史学教授, 2000 年任该校埃默里托斯讲座教授。

柯文在学术界非常活跃, 曾兼任许多研究机构的职务。1965 年他担任了哈佛大学费正清汉学中心研究员, 1979 年任亚洲学会中国委员会研究员, 1981—1982 任费正清中心执委, 2000—2002 年被聘任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外国顾问, 2004 年任香港人文和社会学院顾问团顾问。

柯文早期的研究课题主要聚焦于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史。1957 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传教方式》, 对传教士在中国采用的不同传教手段(上层路线与基层路线)进行了比较分析。1962 年柯文又在《汉学学会会刊》上发表了《晚清反传教士史料》, 系统地整理了清末反基督教运动的历史文献。1963 年他对自己的博士论文进行修改扩充后出版了《中国与基督教: 1860—1870 年间中国的传教运动及排外主义的发展》一书。在史学分期上他认为中国近代史头十年的 1860—1870 年,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规模和范围迅速扩大, 对中国社会和人民的思想都产生了直接影响, 分析这一时期的历史有助于读者正确理解当时充满内忧外患的晚清社会。基督耶稣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的宗教生活, 在反基督教运动的群众和乡绅看来构成了对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威胁, 引起了中西思想文化上的冲突。宣扬“中华归主”和西方近代新文化的神职人员并

非“救世主”的代表,他们对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缺乏全面的了解,遭到抵制只是时间问题。国外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往往只关注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过程中的某一环节而忽略其他。因此柯文决心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1974年柯文出版的第二部著作《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讨论了王韬时代的社会改革问题,如:改良与革命、时代与历史变迁、“传统”与“现代性”、物资丰富与价值观念转型等。柯文认为,过去学术界倾向于把传统与现代性绝对分开是一种僵化观点,排斥了传统文化中某些因素,其实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它们完全可以兼容并存。王韬虽然主张对现存体制进行改革,是近代史上一位先知先觉的人物,然而在他思想上却对于传统依依不舍。柯文在该书最后对王韬及其同时代的一些知识分子进行了集体扫描,肯定了当时中国沿海城市在改革大潮中所具有的活力,获得全国多数城市认可后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柯文在《中国历史揭秘:有关近代中国的美国史学著述》一书中,通过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历史学家撰写的有关中国的专著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式与方法问题。他认为这一阶段的许多美国历史学家以西方中心观(Western-centric Perspective)来解读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因而产生了诸多曲解和歧见,他们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明确指出美国历史学家曾经错误地纠缠于三个基于偏见的分析框架(biased-based frameworks):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传统-现代性模式(traditional-modernity model)和帝国主义模式。这三种模式无一例外地美化了西方国家在中国历史演变中的作用,夸大了他们的影响。

该书共分为四章,前三章分别讨论了三个框架的实质,第四章具体介绍了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模式”(China-centered/Sino-centric model)。第一章重点探讨中国对西方入侵的回应问题。持“冲击-回应”观点的美国中国历史学家把中国出现的巨大变化看作西方冲击的结果,中国自身的作用仅仅局限于对西方的回应。柯文解释说西方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不能被解读为中国人民做出反应的导因,因为当时还有大量其他因素存在,比如太平天国造反和“同治中兴”。他坚持认为有些事情即便西方没有介入也可能发生,中国历史依然发展,义和团举事主要发生在没有西方影响的农村地区,就是其中一例。第二章“传统与现代性”谈到了该模式是建立在中国处于停滞和封闭的前提下,西方以现代性打破了当时局面。在这个

问题上中国被认为只是与西方的水平不同,相比之下显得很落后。这是一个主观模式,因为历史学家估量重大变化的尺度是按照西方定义的“现代性”。这种认识导致历史学家错误地把中国传统视为前进中的障碍。柯文引用了列文森、芮玛丽(Mary C. Wright, 1917—1970)和墨子刻等人的论述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第三章“帝国主义模式:现实还是神话”讨论了柯文的最后一个问题的框架。在他看来历史学家从两个视角建立起这一模式:视角之一是把帝国主义看作中国问题的根源(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人不得不面对他们的干预导致灾难性的现实也是其中一个例证),视角之二是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政治上和智力上的正面与负面的变化。柯文觉得帝国主义模式不仅仅是偏见进入历史解读的证据,也是当代事态促使历史学家通过预测因果关系对历史进行的回叙。柯文赞同这样的说法:与其说帝国主义确实对中国产生了影响,倒不如说是对“打开中国历史万能钥匙”观点的否定。他对历史学家提出了这样的挑战:他们必须指出哪些情形真正与帝国主义有关,然后进一步指出哪些情况如何与帝国主义有关。第四章“迈向以中国中心观编撰的中国史”展示了他对中国历史行动的期待。柯文对美国历史学家的看法是悲观的,因为他觉得要彻底消除史学研究中的种族优越感(ethnocentric bias)几乎不可能。他希望采用“中国中心观”可以减少以“西方中心观”对中国历史的解读。为此他提出了包括四个步骤的解决方案:直接从中国和中国人论题开始研究历史,把中国分成若干个小小区,从基层社会向上进行考察,重视从其他学科引进有效研究方法。

《中国历史揭秘:有关近代中国的美国史学著述》是一部反映了史学评估价值观潮流的代表作。柯文开宗明义地谈到了该书的写作源于个人和专业早期的自我评价,促使自己去揭示存在于中国历史解读中的偏见,进而扩大到对其他美国中国历史学家的深度分析,以及深受美国模式影响的其他历史学家的论述。他承认对于持不同观点者的批评范围有限,而且纯属个人的主观见解,出版该书的用意不在于对中国史学做出最终陈述。此外他还就自己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谈到了一些具体意见,主动邀请其他历史学家参与关于中国史学的对话,希望他们也进行自我评估,一起就史学领域的其他问题进行探讨。柯文议题的核心是提供一个超越中美学术界限的平台,可以使全世界各个领域的历史学家都从中受益。有关在历史中被认为起作用的因素与实际起作用因素的二分法(dichotomy)是历史学家在个人专业中应该重视的专业修养,更确切地说,他们的倾向性可能体

现在对于历史事件和动因的判断之中。柯文率先打破了 20 世纪 50 年代由其恩师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认为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的落后,不可能从本国产生新的变革力量。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反映了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后引发的巨大结构性变动,经过多次改革和革命后才形成了现代中国的面貌。柯文提倡的方法对于中国史学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世界史学的研究也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该书的发表结束了费正清模式时代,为西方汉学界指出了一条研究新思路。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先后掀起了“后殖民主义史学”和“新清史研究”的浪潮,以批判西方殖民者的立场来研究中国近代史,与柯文开拓倡导的方向有密切关系。

柯文的著述和编辑的文稿有:

《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传教方式》(Missionary Approaches: Hudson Taylor and Timothy Richard, Papers on China, Vol. II, 1957 年)。

《1862 年湖南江西反传教士事件》(The Hunan-Kiangsi Antimissionary Incidents of 1862, Papers On China, 12:1-27, 1958 年)。

《中国反基督教传统》(The Anti-Christian Tradi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 2: 169-180, 1961 年)。

《晚清反传教士史料》(Some Sources of Anti-missionary Sentiment During the Late Ch'ing,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No. 2, 1962 年)。

《中国与基督教:1860—1870 年间中国的传教运动及排外主义的发展》(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187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年)。

《王韬对变化中世界的看法》(Wang T'ao's Perspective on a Changing World, in Albert Feuerwerker, Rhoads Murphery, and Mary C. Wright, eds.,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年)。

《王韬与早期的中国民族主义》(Wang T'ao and Incipient Chinese National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 4: 559-574, 1967 年)。

《1850—1900 年的中西冲突》(Ch'ing China: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 1850—1900, 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James B.

Crowley,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70 年)。

《千年追求: 千年革命与中世纪的神秘无政府主义者》(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 Revolutionary Millenarians and Mystical Anarchists of the Middle Ages, rev. and expanded ed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年)。

《〈傅沙士〉前言: 1895—1905 年美国在华传教团》(Foreword to Sidney A. Forsythe, An American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hina, 1895 - 1905,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1 年)。

《欧洲东渐》(Europe Goes East, in Arnold Toynbee, ed., Half The World: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3 年)。

《19 世纪中国海疆和腹地: “基督教”改革家》(Littoral and Hinterland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he ‘Christian’ Reformers,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年)。

《讨论》(Discussion, in John Z. Bowers and Elizabeth F. Purcell, eds.,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China, New York: 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 pp. 75-81, 1974 年)。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王韬与晚清改革》(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年)。

《19 世纪中国的改革》(Reform in 19th-century China, Cohen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年)。

《新沿海改革家》(The New Coastal Reformers, in Paul A. Cohen and John E. Schrecker, eds., 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年)。

《美国青年政治领袖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报告》(Report on the Young American Political Leaders Delegation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1977 年)。

《近期中国发展专稿》(Feature Article o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hina, Boston Globe, July 31, 1977 年)。

《1900年基督教传教团及其影响》(Christian Missions and Their Impact to 1900,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年)。

《剑桥中国史第十卷》(The Cambridge History, Vol. 1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年)。

《1850—1900年中美关系》(Sino-American Relations, 1850—1900, in The Historical Precedents for Our New Relations with China, Washington, D. C.: The Wilson Center, Occasional Paper No. 7, 1980年)。

《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Research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America, Historical Research), No. 2, pp. 85—88, 1980年)。

《近代史》(Modern History, co-authored with Merle Goldman, in Anne F. Thurston and Jason Parker, eds.,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China,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pp. 38—60, 1980年)。

《清末民初美国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动向》(New Directions in America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o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Fudan journal, No. 6, pp. 73—84, 1981年)。

《汉学太极:迈尔与墨子刻谈美国近代汉学研究现状》(Sinological Shadowboxing: Myers and Metzger on 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in America, Republican China, 9. 1: 5—10, 1983年)。

《中国历史揭秘:有关近代中国的美国史学著述》(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年)。

《中国历史上的自由主义考察:是通往世界主义世界的铺路石,还是西方地方观念的最后立场?》(The Quest for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Past: Stepping Stone to a Cosmopolitan World or the Last Stand of Western Parochialism? —A Review of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 by Wm. Theodore de Bar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5. 3: 305—310, July 1985年)。

《国家控制的中国领域:现实还是幻想?》(State Domination of the China Field: Reality or Fantasy? A Reply to Robert Marks, MODERN CHINA, 11. 4: 510—518, Oct. 1985年)。

《答狄百瑞问》(A Reply to Professor Wm. Theodore de Bary, Philosophy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and West, 35. 4:413-417, Oct. 1985 年)。

《谢和耐述评, 中国和基督教的影响: 一次文化冲突》(Review Essay on Jacques Gernet,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 A Conflict of Cul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7. 2:674-683, Dec. 1987 年)。

《中国中心论中的自强: 美国史学的演进》(Self-Strengthening in China - Centered Perspective: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Collected papers from the Conference on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1, 3-35, 1988 年)。

《从历史学视角看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The Post-Mao Reform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August 1988 年)。

《以中国历史学家的身份表示我们的关切: 答高慕轲问》(Our Proper Concerns as Historians of China: A Reply to Michael Gasster, *The American Asian Review*, 6. 1:1-24, Spring 1988 年)。

《社会演变中的环境和体制因素·导言之回应》(Response to Introduction: Situational versus Systemic Factors in Societal Evolution, in Ramon Myers, ed., *Two Societies in Opposi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Forty Years*,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pp.xlvii-liv, 1990 年)。

《跨文化思想: 纪念史华慈中国思想论文集》(Ideas Across Cultures: Essays on Chinese Thought in Honor of Benjamin I. Schwartz, edited by Paul A. Cohen and Merle Goldm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年)。

《有争议的往事: 作为历史与神话的义和团》(The Contested Past: The Boxers as History and Myth, collected article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Boxer Movement and Modern Chinese Society, 1992 年)。

《纪念费正清文集》(Fairbank Remembered, edited by Paul A. Cohen and Merle Goldm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年)。

《费正清: 1907—1991》(John King Fairbank, 24 May 1907—14 September 1991, *Biographical Memoir*, June 1993 年)。

《中国文化: 一些问题的界定》(Cultural China: Some Definitional Issues, *Philosophical East and West* 43. 3:557-563, July 1993 年)。

《我的学术生涯》(My Scholarly Career,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261-63, March 1994 年)。

《我的老师费正清》(My Teacher John King Fairbank,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72-75, 71, May 1994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执教于中国(吉克利)·前言》(Foreword to Edward V. Gulick, Teaching In Wartime China: A Photo-Memoir, 1937-1939,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5 年)。

《历史三解:义和团之事件、经历与神话》(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年)。

《想象红灯照》(Imagining the Red Lanterns. Berliner China-Hefte 12, May 1997 年)。

《从人类学视角看义和团》(New Perspective on the Boxers: The View From Anthropology, 21 Century NO. 45, 1998 年)。

《理解过去的三条途径:作为事件、经验和神话的义和团》(Three Pathways Toward Understanding the Past: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World Sinology, 122-132, May 1998 年)。

《20 世纪晚期中西之间的知识交流》(Knowledge Flow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Wenshizhe, 4: 21-29, June 1998 年)。

《时间、文化与基督教末世学:2000 年的西方和世界》(Time, Culture, and Christian Eschatology: The Year 2000 in the West and the World,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4. 5: 1615-1628, December 1999 年)。

《引言:政治、神话与真实的过去》(Introduction: Politics, Myth, and the Real Past,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6. 2: 1-15, April 2001 年)。

《20 世纪中西之间的不对称知识关系》(The Asymmetry in Intellectu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Zhang Qixiong, ed.,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lected Essays,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1: 61-93, 2001 年)。

《义和团、基督徒和神:被视为宗教战争的 1900 年义和团冲突》(Boxers, Christians, and the Gods: The Boxer Conflict of 1900 Seen as a Religious War, History Studies, 1: 17-28, February 2001 年)。

《关于 21 条件的记忆与遗忘:控制国人记忆的个案研究》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the Twenty-One Demands: A Case Study in Manipulation of National Memory, Measuring Historical Heat: Event, Performance, and Impact in China and the West, November 2001 年);

《中国中心观的由来及其发展:柯文教授访谈录》(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Centered Approach: Transcript of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Paul A. Cohen, SHILIN, 4:32-42, Nov. 2002 年)。

《关于分界日期的沉思:中国历史中 1949 年分界》(Reflections on a Watershed Date: The 1949 Division in Chinese History, in Jeffrey N. Wasserstrom, ed.,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ew Approaches, London: Routledge, 2002 年)。

《中国的中世纪过渡期:1946—1955 年大陆与台湾的延续与变革》(China's Mid-Century Transitions: Continuity and Change o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 1946—1955. Jeffrey N. Wasserstrom, ed.,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ew Approaches, London: Routledge, 2002 年)。

《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ERSHIYI SHIJI 78:34-49, August 2003 年)。

《中美之间:宋美龄夫人的事业》(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The Career of Madame Chiang Kai-shek, WELLESLEY 88. 2:34-38, Winter 2004 年)。

《史学研究的专断标签》(The Tyranny of Labels in Historical Studies, ERSHIYI SHIJI 87:118-119, February 2005 年)。

《拳民人性化》(Humanizing the Boxers, in Robert Bickers and R. G. Tiedemann, eds., The Boxers, China, and the World,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p. 179-197, 2007 年)。

《文化的固有特性:新中国老故事》(The Tenacity of Culture: Old Stories in the New China, in Conference Volume Generated by Fairbank Center Conference on the PRC at 60, May 2009 年)。

《往事述怀:20 世纪中国的越王勾践传说》(Speaking to History: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年)。

《传说与历史: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与越王勾践的传说》(Story and History: Chiang Kai-shek, Nationalist Policy, and the Saga of King Goujian, in

Conference Volume Generated by " Re - assessing Chiang Kai - shek: An International Dialogue Conference, Ontario, Canada, August 2009 年)。

《义和团起义》(Boxer Uprising, in David Pong, editor in chief, Encyclopedia of Modern China, Farmington Hills, MI: Charles Scribner's Sons/ Gale Cengage Learning, pp. 146-148, 2009 年)。

《2010 年再版序: 中国历史研究中国中心观再思考》(Introduction to the 2010 Reissue: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China - Centered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y, i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xxxix - lxxv, 2010 年)。

(十三) 促进中国史学在西方英语世界传播的史景迁

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 1936—) 出生于英国伦敦, 曾就读于温彻斯特学院和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 获得了剑桥大学学士学位。1959 年他得到了克莱尔-梅隆奖学金资助, 以交换生身份到美国耶鲁大学师从史学家费正清的学生芮玛丽。他上的第一堂讨论课就使他开始对中国历史感兴趣, 决定攻读中国史学位课程。他拿到硕士学位后又继续学习中国历史博士课程。芮玛丽推荐他去澳大利亚师从房兆楹教授夫妇继续深造, 他的博士论文《康熙与曹寅》因为造诣很高被授予约翰·艾迪生奖。1965 年他获得史学博士学位后破例被聘任留在耶鲁大学执教, 1970 年芮玛丽去世后史景迁接替了她的教职。他曾给该校本科生上过多年的“1600—2007 年中国现代史”课程, 每次听课学生都多达 500 多人, 得到了广泛好评。1993—2008 年他担任耶鲁大学的史特林历史学讲座教授 (Sterling Professor), 2000 年他加入了美国籍。

史景迁是一位多产汉学家和评论家。他编写过有关中国历史的专著 12 部, 还撰写了相当数量的论文, 主要学术兴趣是通过传记题材来演绎中国文化史。他相信人们是通过形象而不是定义来了解历史的, 但是概念对于人们了解历史也能起到理性化启发作用。他还长期关注中西学者在促进中国现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 并试图分析他们成功和失败的原因。他的文笔流畅、叙事性强, 深入浅出, 视觉独特, 其中一些已经成为畅销读物, 对于中国历史知识在西方英语世界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1974年史景迁出版的《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是一部以第一人称叙述历史的作品。他用文学手法描写了康熙如何操练骑术，结伴狩猎，勤政一生。平日与身边的嫔妃、大臣、王公、太监共享荣华富贵之余，也有自己的烦恼、感叹和内疚。对葛尔丹（1644—1697）的征讨，对三藩之乱的平叛，对西洋文化冲击的担忧，使他食不甘味。他感叹时光易逝，眼看年迈宠臣先后告老还乡，皇位继承尚无对策。这里有史学论著中罕见的形像描写、内心独白、想象驰骋和怨天尤人。因为毕竟作者是外国学者，虽然饱读汉籍，想当然的情节偶尔也现诸笔端。但是他没有忘记自己写的是历史而不是小说，因此故意虚构的文字基本没有。在42页的注释中都是中规中矩的引述和说明。这种介于文学和历史之间的撰史笔法显然有别于叙事史学，大概是史景迁个人的独创，见仁见智的评论层出不穷尽在意料之中。

史景迁1987年出版的《胡约翰的疑问》与《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却有所不同，是一部以西方来华天主教传教士为历史背景虚构出来的故事，没有太多真实的微观史料价值。1622年神甫傅圣泽（Jean Francois Fouquet）奉命回国述职，因为需要中国助手帮助抄写和翻译文稿，就聘任广州圣心会门房胡约翰（John Hu）为随行秘书。但是离开大唐中土之后，胡约翰不但不信守合约旅行职责，却动辄索要银子，把体面行装赠给路人，而且竟然偷享他人的坐骑，还扬言要到乡下去做行脚僧。他在巴黎大街上对妇女指手画脚，敲锣打鼓，用汉语宣传孔孟之学。他的古怪言行引起了路人的反感，又因不懂法语无法跟人交流，被认为得了神经病，必须送精神病院医治。胡约翰在当地精神病院两年半中受尽了折磨，几乎到了崩溃边缘。虽然史景迁引用了大量巴黎、伦敦和罗马教廷的档案和史料，证明自己讲述的事情不是凭空虚构的，但是多数读者还是无法判断该书是历史还是小说。历史上的罗马耶稣会士中确有傅圣泽其人，有趣的是文献记载神甫出生于1663年，与史景迁设定傅圣泽携带大批汉籍前往法国的1622年整整提前了41年！据英国和美国书商销售此书广告所引用的读者述评，多数人对史景迁的这部文稿并不认可。难怪钱钟书访问美国与作者见面时戏称他为“失败的小说家”。

1981年史景迁出版的《天安门：1895—1980年中国人及其革命》再次展示了他的史学著述的风格和特色。他通过这一历史时期的知名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徐志摩、沈从文、鲁迅、闻一多、瞿秋白、老舍、丁玲和茅盾等人，记述了1885—1980年间中国的革命和包括知

识分子在内的各阶级对改良和革命运动的推进。作者在考察这些人物时发现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面对波谲云涌刀光剑影的现实都义无反顾地奋勇拼搏,表现出非凡的生命力和可歌可泣的英雄气概。作者没有引用长篇资料和烦琐的考据,只以平实的语言把自鸦片战争、五四运动、新中国诞生和改革开放前的漫长历史画卷展现在“天安门”的主题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天安门:1895—1980年中国人及其革命》是史景迁的史学代表作。

史景迁多次获得美国、中国香港和英国大学颁发的荣誉称号。他曾应邀担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和南京大学名誉教授,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章伴星曾以他的名字命名。1979年他荣获古根海姆奖金,1982年获《洛杉矶时报》历史奖,1983年获美国科学院和文艺研究所沃瑟尔奖,1985年被推选美国文理研究院院士,1988年荣获麦克阿瑟基金会31万元巨奖,被吸纳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学者委员会委员。1993年他人选美国哲学学会,1997年被聘任为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2004—2005年他被推选为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2006年担任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荣誉讲师。2008年5~6月他为里斯60周年举办的中国史系列讲座曾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中播出。2010年他获得联邦政府授予的人文学科最高荣誉,在国会图书馆发表杰弗逊年度演说。

2008年史景迁退休后与妻子金安平在西黑文安度晚年,但是学术研究仍是他日常生活中的最大乐趣。

史景迁在40多年的教学研究生涯中撰写了14本有关中国历史文化专著,其中广为人知的有:

《曹寅与康熙》(Ts'ao Yin & The K'ang Hsi Empero, 1965年)。

《改变中国:1620-1960年在中国的西方顾问》(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 1969年)。

《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 Hsi, Alfred A. Knopf, Inc. 1974年)。

《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 1978年)。

《天安门:1895—1980年中国人民及其革命》(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 1981年)。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1984年)。

《胡约翰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John Hu, 1987年)。

《汉语迂回表达法:历史文化论集》(Chinese Roundabout: Essays on